

书评

《人口学百年》简评

冯立天

对中国来说,20世纪既是历尽沧桑苦难曲折的百年,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不平凡的世纪。她经历了清末、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截然不同的时代。虽然不同时代所要解决的国内外诸多矛盾,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,但她们都面临人口不断膨胀这一现实。这是引发不同时代政府官员、政治家和学者研究这一人口现象的历史背景。于是,便产生了不同时代不同人士的各种人口思想。19世纪末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学说传入中国,而我国在20世纪初人口估计已达4亿,当有人提出“人满为患”的见解与忧虑时,不少学者持信奉和传播马尔萨斯主义的立场;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持否定态度;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左派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,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。

关于中国人口是否已经过多、需要设法控制的争论,成为我国进入20世纪后学术界和政治家们讨论和争论不休的话题,而且越来越带上了政治色彩。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50年代。我国人口和人口理论发展所经历的曲折历程,鲜明地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悲壮、生动的图景。

当中国全民奋力摆脱三年困难时期刚刚恢复元气未几,又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动乱前半期人口处于盲目发展状态,1966年至1970年,5年间净增人口超过1亿,每年出生人口在2500万到2700余

万之间徘徊,出生率均在33%以上。政府被迫在全国范围内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鏖战正酣的混乱环境中,推行旨在限制人口过快增长的计划生育工作。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运动,呼唤人口理论的诞生,以便给实践以支持、指导并解决一系列困惑人们的学术问题,从1974年起形成人口理论研究的热潮,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。研究最突出的成就,是确立了两种生产理论并成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石。

80年代和90年代,中国人口学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,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人口学研究的学科领域,而且不断向纵深发展。全国性的高质量人口普查和有关人口的专题抽样调查数据的公布,以及原始数据带向研究者提供,西方当代人口学方法和研究成果的传入,改革开放为研究所创造的宽松的政策环境,实践中不断冒出的新问题等等,都是推动中国人口学在近20年来获得空前发展的重要条件。中国人口学发展水平已经接近、达到或跻身于国际学术界的前列,个别领域甚至处于领先地位。

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、北京市人口学会组织编写,查瑞传为主编,胡伟略、翟振武为副主编的《人口学百年》专著,已于近期由北京出版社出版。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,对浩如烟海的百年文献资料,按历史年代顺序进行梳理,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,把她放到该

历史年代所处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进行剖析和评价。采用了以史为据、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。全书分列4篇共13章:第1篇论述中国现代人口学形成的历史渊源,包括早期随人口增长而产生的人口思想,西方资产阶级人口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的传入,清末和民国时代面对“人满为患”问题不同阶级派别所持的人口观点,以及清末和民国时代与人口学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口调查介绍。第2篇回顾了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初期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初步探索与正统解释,以及人口思想受当时“一边倒”政策的影响状况。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和1957年初毛泽东带头谈论中国人口问题而引发的人口研究热潮。马寅初《新人口论》的发表及1957~1960年对马寅初的批判。第3篇反映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计划生育实践如何推动中国人口学的复苏,并最终取得了“中国人口必须控制”的共识,这是经过百年迂回曲折、充满苦涩的争辩和探索之后的世纪性成果。第4篇展示了中国人口学全面发展与繁荣景象。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四次高质量的人口普查、两次人口抽样调查和若干全国性的专题抽样调查。与第1篇相应章节清末和民国时代的人口调查介绍的情况相比,真

可谓有天渊之别。此篇还就诸如人口与经济关系、生育政策、人口迁移与城市化、人口容量、人口老龄化、社会老年学、人口史和人口思想史等专题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与评述。本书作者在最后一章中高屋建瓴,高度概括了人口研究的百年经验与教训,指出:人口研究必须实事求是,防止教条主义;研究人口问题必须加强调查,抓住实质。短短两句比较抽象又老生常谈的话语,只有那些在人口研究领域长期奉献的负责任的学者,才能领会其真正的含义和份量。

《人口学百年》是我国第一部人口学发展百年史的学术专著,资料较为详实,其中收集了不少十分可贵的学术素材,历史背景与学术观点的形成联系紧密,再加上作者的评论,可谓做到了历史、观点与评判三结合,这是写作这本书时所采纳的一种研究方法。至于说评判是否客观公正,这个问题最好交由读者自己去甄别。当然,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至善尽美的,《人口学百年》自不例外,我想,如果能给本书主编和作者以更充分的时间,在内容上定会更加充实,会更全面反映人口学各领域的学术成就。但不管怎样,这本著作的出版问世,在人口学研究的园地里,又绽开了一朵引人注目的鲜花。

(上接第43页)

参考文献:

[1] Caldwell, J. J.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. N. Y.: Academic Press 1982. 28-49.

[2] 顾宝昌. 综论中国人口态势. 上海: 上海科学出版社. 1998. 79-80.

[3] Zolotukhina W. V. . The concept of Independence in Soviet and American Families. in Family: East and West, ed. by Phyllis Lan Lin et al. Volume I University of Indianapolis Press 1992. 55-60.

[4] 广信财经快讯. 0417, 中国拟清理国有资产以偿还养老金. 2000-04-15, 广州市电信局 (clander@info.gznet.com).

[5] 新华社. 我国城市水平达到 30.9%, 网易-新闻

www.163.com, 2000-04-15.

[6] Riley, M. W. Social gerontology and the age stratification of society. In C. S. Kart and B. Manand(eds)., Aging in American. Port Washington, New York: Alfred 1976. 194-195.

[7] 冯立天. 低生育率与老年型人口. 中国稳定低生育率水平学术研讨会(人民大学), 2000-04-20.

[8] Easterlin, R. A., What will 1984 be like;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recent twists in age structure. Demography 15(4), 1978. 397-432.

[9] 张纯元. 人口经济学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84. 110-189.

[10] 许晓峰. 筹资与投资分析. 北京: 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8. 41-48.